

改革 · 发展 · 协同

魏礼群 李金早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发展·协同 / 魏礼群，李金早著 .

-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5

ISBN 7-80087-156-8

. 改... . 魏... 李...

. 经济体制改革 - 研究 - 中国 . 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04122号

前 言

如何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甚至成败，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和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力地表明了我们在改革与发展关系的处理上是成功的。为了全面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顺利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认真研究和总结改革与发展结合过程中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在新时期使改革与发展更加有效地结合的途径。

从1992年开始，我们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结合的理论及政策取向》。三年来，我们结合经济工作的实际，陆续完成了本课题的一批研究报告，继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课题总报告，即《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推进改革》。现在，我们将研究的成果汇辑出版，既是为了就教于读者，也是试图借此促进这方面问题的深入研究，探寻改革与发展结合之路，以胜利地完成我们所面临的改革与发展的双重伟大任务。

本书得以顺利完成并付梓，是与许多人士的热心关注和鼎力相助分不开的。我们谨借此机会，特别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中国发展出版社朱兵等同志。国家计划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及其他有关司局的同志也给予了许多帮助，我们在此一并致谢！

魏礼群 李金早

1994年9月12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篇 总 论

| | |
|---|-------|
| 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推进改革，更加有效地完成改革与发展的双重任务..... | (3) |
|---|-------|

第二篇 改革篇

| | |
|-------------------------------|---------|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要求..... | (37) |
| 市场导向改革的必然性及途径..... | (55) |
| 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 (66) |
| 新型宏观经济调控体制的基本框架..... | (81) |
| 加快计划和投资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 | (113) |
| 以《决定》为指针，深化计划体制改革..... | (131) |
| 改革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基本步骤..... | (147) |
| 建立和规范固定资产投资市场..... | (153) |
|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 | (156) |
| 建立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合理分权的新体制..... | (174) |
| 中央与地方的投资管理权限关系面临的问题及改革方向..... | (202) |

第三篇 发展篇

| | |
|--------------------|---------|
| 加快发展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 | (215) |
| 积极推进国民经济再上新台阶..... | (228) |

| | |
|-----------------------------|---------|
|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方向和任务..... | (237) |
|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瓶颈”与产业政策..... | (252) |
| 积极采用BOT方式，加快我国基础设施建设..... | (267) |
| 不断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 (277) |
|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 (287) |
| 正确研究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长期规划..... | (301) |

第一篇 总论

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发展中 推进改革，更加有效地完成 改革与发展的双重任务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与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主题和两大任务。而如何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则是贯穿于这两大任务的基本课题。可以说，改革以来的历程正是我们不断探索改革与发展最佳结合的过程。我国16年来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举世瞩目，连一些原来对中国改革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的人士也不得不信服。我们的确积累了一些改革与发展结合的经验，但是也要承认，这些经验仍然是很不充分的。而且，我国改革和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今后，无论改革还是发展，都将面临许多新矛盾、新问题。如何在本世纪最后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至更长时间继续使改革与发展有机的结合，全面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顺利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使国民经济再上若干个新台阶，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新课题。

总论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比较改革中的渐进和突进两种方式，分析改革与发展相结合必要性；第二部分，总结我国改革与发展结合的基本经验，同时分析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教训；第三部分，分析新时期改革与发展结合的主要原则和实现途径；第四部分，探讨如何使改革与发展进一步的有效结合，更

好完成改革和发展的双重任务。

一、渐进与突进：从两种改革方式看 改革与发展相结合的必要性

改革与发展相结合的问题，只有在进行改革的时期才存在，因为没有改革，也就无所谓改革与发展的结合。改革与发展能否结合以及怎样结合，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取决于改革道路的选择。选择突进式改革道路，在短期内推出“一揽子”一步到位方案，搞“休克疗法”，那么改革与发展则难以结合。反之，选择渐进式改革道路，那么，改革与发展的结合就成为可能。中国和前苏联的改革实践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前苏联曾在50年代就提出过改革，但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未能继续进行。进入80年代后，在我国改革的第七个年头，即1985年，前苏联又开始了改革。在这一轮改革中，主张“休克疗法”、“一揽子改革”的人很多。所谓“三百天私有化改革方案”和“五百天私有化改革方案”等一批急进改革方案相继登台。1990年，他们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姆斯设计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式的改革方案。由于这些推行私有化和放开价格的方案不顾当时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和老百姓对改革的承受力，因而使得经济不断恶化，通货膨胀率直线上升，1991年通胀率由1990年的两位数上升到三位数，莫斯科国营商店里的食品和消费品价格猛涨了二至四倍。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年经济统计资料，在前一年的基础上，日用品价格竟上涨25倍，而工业生产却下降18.8%，农产品下降80%，国民收入减少20%。

我国改革与前苏联改革形成鲜明对照，我国改革虽然在局部和某个阶段上曾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是总体来看是在稳步推进，从开始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

标，根本打破了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逐步向城市推进，由生产环节逐步向流通、分配、消费环节拓展，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得到发育和成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步扩大。以我国最早进行改革的农业生产领域为例，1979年以前，国家计委对25种主要农产品产量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并对这25种产品的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下达分地区的计划指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逐步减少，到1985年已全部取消。1991年，实行指导性计划管理的农产品生产也仅限于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烤烟、黄红麻、桑蚕茧、茶叶、肉类总产量、蛋类、奶类、绵羊毛、水产品、造林面积、天然橡胶等15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农产品。同时，国家对粮食和棉花采取合同订购和统一收购的办法。1993年，国家取消了对黄红麻、桑蚕茧、茶叶、肉类总产量、蛋类、奶类、绵羊毛等6种产品的指导性计划管理。这样，对农业生产的指导性计划管理的范围进一步缩小。同时，在广东省进行了取消粮食合同订购的试点。1993年，进一步取消肉类、淡水产品的产品的生产计划指标。取消粮食合同订购的试点，由广东扩大到浙江、福建、湖南等省份。

继农村改革之后，1988年开始了城市改革。城市改革也是逐步深化的。以工业生产管理体制改革为例，1980年国家计委管理的指令性计划产品120多种，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0%；1985年减少为60多种，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下降到20%左右；1992年，指令性计划产品品种继续减少，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降到11.7%。1993年、国家对工业生产计划实行分类管理，对关系国计民生、垄断性较强的产品，如原煤、原油、天然气、电力等，保留部分生产计划任务。而对竞争性较强的冶金、化工、机电、轻纺工业产品，有的不再列入计划，转而实行市场调节；有的只列全国总量计划指标，不再分解下达。这样，到1994年由国家直接管理的工业产品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4%左

右。

我国价格管理体制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改革的过程。1978年以前，基本上所有产品都由国家直接定价，改革以来，价格逐步转向市场调节。1992年，国家先后放开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由市场调节。目前，农民出售的农产品中90%以上的部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95%左右、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中85%以上都由市场调节。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价格由市场调节的程度已超过某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

由以上可见，我们选择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这一改革道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充分注意处理改革中的量变和质变关系，使改革与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我国16年来的改革，不仅打破了传统的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扩大了市场调节的范围和程度，从而推进了经济体制的转换，而且在改革的进程中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国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从1978年到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2.8倍，年均增长9.3%，创造了经济奇迹。这是我国历史上，也是同期世界各国中经济增长最快的速度。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兴旺。粮食生产连上三个台阶：1979年为3000多亿公斤，1982年为3500多亿公斤，1984年为4000多亿公斤，1993年达到4500多亿公斤，产量占世界第一位。工业生产迅速增长，主要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1993年煤产量达11.4亿多吨，比1978年增长85%，居世界第一位；钢产量达8868万吨，比1978年增长1.79倍，居世界第四位；发电量达8200亿千瓦小时，比1978年增长2.19倍，居世界第4位。改革以来的16年中，我国共建成了1764个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完成了1500个限额以上的技改项目。改革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城乡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99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922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长2.29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达到2337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

长1.52倍。由于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人的寿命明显提高，目前全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男性为69岁，女性为71岁，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国和前苏联改革的不同方式和道路，从正反两方面雄辩地说明了改革与发展相结合是十分重要的。那么，我们由此可以得出哪些结论呢？换言之，我们如何从理论上说明改革与发展结合的这种必要性呢？

（一）改革需要发展为其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决定了改革必须与发展相结合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起初在经济上都比较困难，物质基础比较薄弱。如果在改革的过程中忽视了发展，改革就会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我们进行的改革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只能摸索着前进，改革的局部失败和短期失利总是难免的。这就需要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以承受这些局部失败和短期失利带来的影响。同时，改革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在此期间，既有新旧体制之间碰撞所产生的副作用，也难免出现不测情况，如自然灾害带来意想不到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质能力应付灾害，连老百姓的温饱生存都成问题，就更谈不上搞改革了。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幅员广大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除地震火灾外，南涝北旱或北涝南旱时常发生。1991年和1994年的特大洪灾和旱灾殃及十多个省份。国家不得不运用储备，才得以安置灾民，支持他们恢复生产。

这些情况表明，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就缺乏支持的物质基础。1978年以来的16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16年，也是经济高速增长16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既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又为进一步改革提供了物质基础，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成功本身，从物质基础上说明了改革与发展结合的必要性。

（二）改革需要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因而有必要与发展结合

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即使从长期来看，物质储备比较丰富，也难以避免短期经济波动。如果各方面经济关系都绷得很紧，特别是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那么，设计再好的改革措施也难以出台，即使出台了，也难以顺利实施。然而，几年前人们对这一点的认识并不是十分一致的。例如有的文章就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是需求大于供给，各方面的约束都很强，经济困难很大，不然，就不需要改革了，因此，不可能等到经济环境宽松了以后才搞改革。这种观点曾具有较大的影响。事实上，我们所讲的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是相对而言的，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应把握在经济发展状态比较好的阶段，例如没有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同时，改革措施的出台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创造比较宽松的环境。因此，改革能否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实质上是改革是否与发展真正结合的问题。要想把握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就必须注重改革与发展的结合。

（三）改革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改革措施长期不能给群众带来看得见的实惠，势必使改革失去群众基础

我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支持，就是因为改革在不同的阶段真正给他们带来了现实利益。1978~1982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6.3%，农民人均收入和职工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分别增长67.4%和38.3%。城乡新建住宅25亿平方米，城镇安排了3800多万人就业，“文革”期间遗留下来的返城知青的劳动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短短的五年，使饱尝十年动乱之苦的人民群众亲身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人民群众继续支持改革，也仍然是由于改革继续给他们带来实惠。1982~1986年农民人均收入由270.11元上升到423.76元，年收入2000元以下的农户从占户数的26.8%下

降到11.3%。四年期间，又有15.5%的农户摆脱了贫困，22%的农户从温饱进入到比较宽裕的生活阶段。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1986年以后，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又有了新的改善。改革以来15年的总体情况更加明晰地显示了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的显著改善。如前所述，1979~199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2.3倍，年均增长8.5%；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实际增长1.52倍，年均增长6.3%。15年累计，城镇新增加就业劳动力近8000万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1.2亿人左右。所有这些变化，都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继续拥护、支持并投身于改革。

（四）发展需要依靠改革，首先在于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使经济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改革以前的十多年，我国经济处于一种徘徊状态，尤其“文革”十年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过去长期未能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在“一大二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形成了排斥市场经济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在建国初期经济发展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后来这种体制变得越来越集中，越来越排斥市场，从而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1978年以后，先是农村改革，实行包产到户，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相当一部分地区过去长期存在的温饱问题得到初步解决。继而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实行放权让利，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也很快调动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工业生产有了新气象。15年体制改革大大解放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五）发展需要改革，也在于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

初始阶段的改革虽然使过去长期被传统体制压抑的生产潜能释放出来，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经济发展必然又会遇到新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就是初始阶段的改革只能缓解经济生活中的浅层

次矛盾，而那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包括经济总量平衡了，投资饥饿症，消费饥渴症以及结构性矛盾；也包括企业产权制度、价格形成机制、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体制，等等问题，不可能由初始阶段的改革来解决，而只能通过深层次改革才能逐步缓解。这样，也才能为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深厚的动力源泉和良性循环的体制保障。

（六）发展需要改革，还在于只有改革，才能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中推进经济发展

我国过去长期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搞建设，这既与“左”的指导思想有关，也与战后世界冷战状态相联系。随着两极世界的解体，冷战时代的结束，世界的开放度越来越大，各国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日益提高。在这种格局下，无论哪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快速发展。然而，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体制和运行机制都还很不适应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不适应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更加主动地占领国际市场的要求。这种状况是长期形成的，需要在体制上进行大的改革，在运行机制上进行根本的改造。只有通过这样的改革，才能真正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种市场，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近16年来的发展表明，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1993年同1978年相比，对外贸易总额由206亿美元增加到1957亿美元，增长8.5倍，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2.79倍。即使扣除美元贬值的因素，前者的增幅也大大高于后者。这就意味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同时，15年来利用外资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由上可见，无论从改革方面分析，还是从发展方面分析，都可以看到改革与发展结合的必要性。从改革方面来说，改革在客观上需要必要的物质基础，以应付局部的失败和短期失利带来的影响，以及自然灾害的不测打击；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

以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需要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以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而这一切归结起来都需要经济有相应的发展，从而决定了改革必须与发展相结合。从发展方面来说，要打破传统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束缚，进而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同时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中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占领国际市场，必须靠改革。这就是说，发展的根本出路在改革。正是改革和发展各自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它们结合的必要性。

二、我国改革与发展结合的经验总结

16年来，我们在改革与发展的结合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认真总结的教训或失误。为了使改革与发展进一步的有机结合，完成本世纪末改革和发展的双重重大任务，有必要认真总结和分析16年来改革与发展结合的基本经验和失误。大体而言，我国改革与发展结合的基本经验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一）根据中国国情，我们选择了一条积极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从而使改革与发展的结合成为可能

我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不同时期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实际上为我国改革提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改革模式。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同志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积极性。我们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制定这个方针的，几年功夫就见效了。”在农村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后，1984年，党中央决定将改革由农村推

向城市。小平同志在1987年6月12日指出，“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城市改革走的也是由点到面，由易到难、逐步推进的路子。从企业改革来说，先是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继而是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企业经营机制改革，进入90年代以来，逐步进行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我国对外开放也是逐步展开的。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欢迎国外投资者到我国投资，与我方举办合资企业。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及厦门设立经济特区。1984年5月4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992年，党中央决定将对外开放的地域进一步扩展到沿江、沿边地区和省会城市。对外开放的领域也由生产领域逐步扩展到流通领域、金融领域等。目前，全国已经形成多方位、多领域的开放格局。

总体来说，我国改革开放选择的是一条渐进式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并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小平同志几次提出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在1992年1月到2月视察南方时谈到，“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同时，小平同志也始终注意把加快改革与有步骤地改革结合起来。1986年12月19日，他指出，“我们的改革到底要走几步？多长时间完成？请你们研究一下。” 1987年6月12日，又指出，“总之，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

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8～239页。

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2页。